



法兰克福学派 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概览*

■夏 巍

【提 要】法兰克福学派延续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文化批判角度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路向。除此之外，该学派还存在着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非主流的研究路径，它在批判理论的建构、转型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使之遵循并发展了马克思文化阐释的初始路向，其文化批判才得以建设性地补充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重要维度。对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并未在国内外学界广泛、充分地开展。目前已经探讨了波洛克、诺依曼、格罗斯曼、基希海默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霍克海默、阿多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系；考察了新马克思阅读运动。有待加强与深化的研究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含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法兰克福学派中重要地位的充足依据；紧扣专题的系统性研究；法兰克福学派其他成员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容及借鉴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批判

【中图分类号】 B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47(2019)07-0087-06

【DOI】 10.19632/j.cnki.11-3953/a.2019.07.015

一、法兰克福学派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对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所作贡献最大、最富原创性和影响力的思想流派，它所创立的批判理论不仅为我们全面而深入地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开启了独树一帜的多维批判的视角，而且提供了在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去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验和路径。

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开创了从文化意识角度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路向，法兰克福学派

承袭和发展了这一传统。从批判理论整体发展历程的外在表现来看，他们的确主要是在这一路向上推动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因此，学界长期以来对批判理论的共识是，其突出的理论着墨点和代表性研究成果就是在文化意识领域，这主要是基于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弗洛姆、洛文塔尔等人是着眼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问题即人的全面异化，从人性和社会的对立对资本主义社会和工业文明展开的独到而深入的文化、哲学批判而作出的判断。事实上，在这之外，法兰克福学派还存在着一条虽不占据主流但依然重要的研究路径，这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一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研究”(项目编号:18ZDA001)、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习近平对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发展的重大贡献研究”(项目编号:19CXSJ23)、山东大学青年学者未来计划项目“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项目编号:2016WLJH19)的阶段性成果。

代的行政总管波洛克、经济学家格罗斯曼、政治学家诺伊曼、法学家基希海默等人侧重于从经验研究与理论批判相结合的角度诊断社会现实和理论建构的研究。^[1]但十分遗憾的是，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遮挡住了他们的光彩，从而使后世学者对他们的研究无法充分而深入地展开。

当然，这并不能从根本上遮蔽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其批判理论建构与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事实上，法兰克福学派之所以侧重于开展文化、哲学批判，在于他们发现这是一个足以达到主体性自觉的领域。基于此，才将这个领域作为重要的理论研究的突破口，其旨趣十分清晰，即探讨上层建筑是如何被工业化的，从而揭示出人们已完全陷入资本钳制的境况之中。^[2]正如德国学者罗尔夫·魏格豪斯所看到的那样：“在他们看来，问题不在于能否搞出一个规划——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超越来发扬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在于如何能更清晰地勾画一些更贴近当下历史事件的正确结论。”^[3]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也的确表达了这种主张：“要想对世界历史做出哲学意义上的解释，就必须说明理性对自然的支配是怎样克服所有的偏差和障碍逐步取得今天的胜利的，以及是怎样将人类的所有特性统合起来的。此外，由此也可以看出各种经济形式、规范形式以及文化形式。”^[4]

霍克海默、阿多诺等批判理论第一代理论建构和转型，受到了波洛克、格罗斯曼等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刻影响。正是基于此，早期批判理论才成为不是仅仅停留在观念层面上的文化、哲学批判，而是有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坚实后盾，因而依然行进在历史唯物主义文化阐释初始路向上，并延续着马克思尚未开展出来的文化理论的精神。^[5]在这个意义上，批判理论的文化、哲学批判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建设性意义的补充，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推动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重要维度。以哈贝马斯、霍耐特为

代表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法兰克福学派恰恰是脱离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基，从生产逻辑之外去探寻未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遮蔽的感性意识的救赎之路，因而弱化了资本批判的锐利锋芒。

有鉴于此，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已经成为全面而客观地认识和评价法兰克福学派的关键。本文将系统地梳理和介绍国内外学界关于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相关研究成果，并概括和反思当前研究状况，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二、国外研究状况

对这一专题的国外研究始自20世纪60年代，但始终未能激起学界广泛的研究热情。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法兰克福学派自身的原因。该学派并未在这一领域形成系统性的研究成果。政治经济学批判只是格罗斯曼和波洛克等人的理论侧重点，尽管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曾强调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于批判理论传统的重要意义，但是并未将其作为理论重心，因而学界对其关注度不高。其二，这是由社会历史发展状况所决定的。法国五月风暴之后，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日渐强势起来，西方左派运动陷入了困境，因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就更难以吸引关注。研究状况发生显著的改观是进入21世纪之后，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引发全球热议和深入探索开始的。2008年爆发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全球经济一度呈现衰退的趋势，西方社会的政治氛围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掀起了新一轮对抗资本主义的浪潮。学术界开始重新密切关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以解读当代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发展特质，因此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者们开始关注和挖掘该学派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

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已有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波洛克、格罗斯曼、诺伊曼、基希海默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入探索。具有代表性



的研究成果如下：

德国学者罗尔夫·魏格豪斯在其论著《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中，对波洛克等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行了较为完整和深入的探讨。

就波洛克的研究而言，他首先围绕着波洛克的《苏联计划经济中的实验（1917—1927）》一书加以分析。他认为，波洛克终生都轻视哲学理论，不仅坚持科学社会主义而且还有自然科学性质的观点，一直开展经验研究工作。与格罗斯曼的主张不同，波洛克认为资本主义的弱点并不是平均利润率下降这个趋势，而是经济部门之间不协调的关系。在涉及波洛克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它的可能性和限度”》一文时指出：波洛克的观点是，与私人资本主义相比，国家资本主义是经济上更切合现实的形式，它废黜了市场自主性是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决定因素。但是这一观点缺乏充分的论证。

罗尔夫·魏格豪斯在对诺依曼的研究中谈到，诺依曼的经典之作《巨兽》的基本观点是纳粹体系的属性根源在于资本主义本身。事实上，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已经发展到了更危险阶段，根本不可能有避免危机的资本主义形式。但是诺依曼并未构想出一种非资本主义的具权威性质的社会形式。另外，他批评波洛克的国家资本主义观难以阐明垄断资本主义如何向国家资本主义过渡的，也无法说明德国具有国家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总之，波洛克不仅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相矛盾，也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但是在罗尔夫·魏格豪斯看来，诺依曼对波洛克的批评有些求全责备，因为像列宁、布哈林使用“国家资本主义”时也未形成一套过渡理论。

关于对基希海默的研究，罗尔夫·魏格豪斯认为，基希海默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刑法》《政治妥协的结构转型》《国家社会主义的法律秩序》等文章，不仅资料翔实丰富，而且是以普遍观念为核心的研究。倘若没有他的这一耕耘探

索，社会批判理论难以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只是极为遗憾的是，他的研究遭到了霍克海默的轻视。正是法兰克福学派未对诺依曼和基希海默的研究加以充分地重视，错失了进行深度跨学科研究的大好机会。^[6]

瑞士学者埃米尔·瓦尔特-布什在《法兰克福学派史——评判理论与政治》一书中着重考察了波洛克和诺依曼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他认为，波洛克的基本主张是国家资本主义会在自由市场经济能力发展到极限时自然发展起来，因而资本主义系统不会达到崩溃的地步。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控能力在波洛克国家资本主义观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波洛克还区分了国家资本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罗斯福新政、希特勒民族社会主义体系分别代表了民主制国家资本主义、极权制国家资本主义。在埃米尔·瓦尔特-布什看来，同激烈批判资本主义的观点相比较，波洛克的国家资本主义观更加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它使分析和评判不同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具有了可能。就诺依曼而言，他认为诺依曼对波洛克坚持民主制国家资本主义具有较强的自我调控及发展能力，因此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灭亡理论有局限性的观点的认知，经历了从20世纪40年代坚持灭亡理论是正确的，因而对波洛克展开激烈地批判，到50年代以后开始接受波洛克观点的转变过程。他还指出，极权制垄断资本主义概念是诺依曼《比蒙》一书的核心，它既指私人资本主义式的垄断经济，也意味着极权制国家调控的指令性经济。^[7]

另外，在英国学者弗雷德·拉什主编的论文集《批判理论》中，波斯东的《批判、国家与经济》一文也探讨了波洛克、霍克海默、诺伊曼、基希海默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并着重阐明了这一研究在批判理论转型中的作用。^[8]

（二）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挖掘和阐释。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美国学者马丁·杰伊的论著《法兰克福学派史》。

他断言,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既侧重于文化研究,也继承了《资本论》的研究方法,交换原则等经济学分析方法是他们把握资本主义的关键。^[9]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在《晚期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涉及了对阿多诺的理解。他的观点是,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中就已说明,自己论证的主题与马克思对价值问题的探讨有着紧密的关联。对同一性和非同一性范畴的论证与《资本论》中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研究是联系在一起的。^[10]德裔英国开放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维尔纳·博内菲尔德在其论著《批判理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交换领域中的价值形式问题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纽带。阿多诺能形成同一性批判与之有着直接的关联。为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视角的正是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11]另外,德国学者汉斯-格奥尔格·巴克豪斯在《新马克思阅读的开端》一文中表达了他对霍克海默的看法:霍克海默晚期笔记印证了他确实强调过批判理论并非是与马克思的理论不同的东西,只有一种更好的经济学理论才始终是理解时代的钥匙。^[12]

(三)对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发掘和探索。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德国学者英格·埃尔贝的论著《西方的马克思:联邦德国1965年以来的新马克思阅读》,该书提出的根本观点是,新马克思阅读运动是与正统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并列的第三个重要范式,它发展放大了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传统,是晚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13]主要的代表性论文是R.贝洛菲尔和T.R.瑞瓦的《新马克思阅读——复归政治经济学批判于社会批判之中》。他们在文中指出,巴克豪斯、赖希尔特等人承袭了阿多诺批判理论的遗产,将政治经济学批判视作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关键。其理论旨归在于重新审视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当代意义,并深入探讨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重建马克思价值形式辩证法和

资本逻辑批判。^[14]

三、国内研究状况

国内学界对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同样长期处在被忽视的状态,研究成果并不多,而且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的探索。主要原因大致有两点:首先,译介进国内的第一本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专著是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该著提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已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转向了哲学和文化研究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人们对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性质的判断。另外,国内学界没有能够及时地关注和引入德语世界这一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

目前该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波洛克、诺伊曼、格罗斯曼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较为深入的探讨。柴方国早在1995年就发表了《波洛克与法兰克福学派》一文。文章认为,波洛克对社会发展中计划问题的研究、其“国家资本主义”概念都促使了法兰克福学派转变研究视野,从先前不轻易认同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性转向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关系研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波洛克的论断的确缺乏实证的分析论证,也未指明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过渡的具体路径。^[15]

之后这一专题的研究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空档期,直至2009年才开始零星出现一些研究成果。其中有张亮的论文《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与政治经济学》,文章着重探讨了格罗斯曼和波洛克政治经济学理论对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形成与转型中的作用。张文认为,最先为批判理论提供政治经济学基础的是格罗斯曼。他的代表作《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规律与崩溃:危机理论》从表面上看仅仅是证明资本积累规律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趋势,然而,事实上,他是在为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提供潜在的政治经济学

基础。他与卢卡奇的目的都是为了使无产阶级主观能动性不被资产阶级的物化意识所遮蔽,利用崩溃的历史趋势这种客观可能性,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波洛克之后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引入计划因素便能控制制度崩溃的观点,使得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调整了理解资本主义的角度,从而推动了批判理论逻辑的转变。波洛克致力于自动化及其社会效应问题的研究,从经济学上证明了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可能性,从而导致法兰克福学派重返德国之后隐藏批判理论的革命立场。^[16]

单传友的《政治优先性:波洛克论国家资本主义》一文认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正是在波洛克影响下的批判理论转型的代表作。不仅如此,波洛克对国家资本主义泛政治化解读也为哈贝马斯和奥菲的权力政治批判路向奠定了根基。^[17]

高红明在《“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波洛克与诺伊曼之争》一文中对波洛克和诺伊曼的观点进行了比较分析。高文指出,诺伊曼坚决反对波洛克以国家资本主义来探讨纳粹主义,认为纳粹主义不可能是国家资本主义,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亦无共通性,事实上它是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尽管诺伊曼与波洛克都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和批判纳粹主义,但波洛克更侧重于政治的优先地位,诺伊曼则突出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18]

(二)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发掘分析。张亮在《霍克海默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创新道路》一文中提出了霍克海默始终视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批判理论基石的观点^[19],但并未就此作更为详尽的论证。李乾坤在《理性自我否定的现实根源——析〈启蒙辩证法〉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一文中,从启蒙与神话、文化工业、纳粹主义与反犹运动等方面详细阐释了《启蒙辩证法》中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如何沿用了《资本论》中的经典原理。^[20]

(三)对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历史性考察。李乾坤的《“新马克思阅读”运动:当代德国马克思研究的一种新纲领的探索》一文具体探讨了新马克思阅读运动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深刻渊源、具体研究纲领和基本理论主张、研究的重要意义等内容。^[21]张义修在《当代德国马克思研究的总体格局与四种模式》一文中从研究模式上分析了新马克思阅读运动致力于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中心的马克思研究与马克思文献学研究、左翼马克思研究、以哲学为志业的马克思研究三种模式的异同,并从理论源头的梳理上提出了该运动虽受到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但更忠于马克思原著的主张。^[22]

(四)对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关系的揭示。余晓敏和胡翼青在《再度解蔽:为法兰克福学派辩护》一文中指出,在总体基调上,法兰克福学派明显倾向于社会批判,政治经济学研究并未凸显出来,这也是霍克海默和格吕堡时期的重要差别。事实上,这可能出自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观选择。他们并不缺乏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能力,并不是刻意发展文化理论,而是把根本落脚点放在诠释工业逻辑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和对人的心理机制分析上,这种文化研究正是建立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石上。^[23]

四、需要进一步深化的问题

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深入与拓展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但仍有一些十分重要的内容有待进一步探讨和厘清。

其一,学界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含义仍然存在着一定分歧。在笔者看来,研究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批判应首先澄清这一前提性问题。这就需要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考察基础性论断后才能对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批判

作更进一步的断言。

其二，虽然有的学者得出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是奠基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上的论断，但是未能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论证。不仅如此，在笔者看来，批判理论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其话语路径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和分殊，因而对这一论断的证明应从此处着眼，展开全面而具体的分析。

其三，现有研究主要是就法兰克福学派个别理论家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作局部的探讨，缺乏紧扣这一专题的深入而开阔的系统性研究，而这种研究显然是十分必要的，因为确立起完整形态的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重新审视其文化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系、全面把握法兰克福学派以至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重要贡献都是关键一步。

其四，学界只重点研究了霍克海默、阿多诺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态度并试图挖掘出他们文化研究背后的政治经济学基础，却没有关注其他理论家。例如：本雅明、马尔库塞、弗洛姆尤其是洛文塔尔等人的相关思想。只有对他们进行全面的考察与分析，才能进一步澄清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批判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因而这在今后的研究中有待补充和拓展。

其五，充分提炼法兰克福学派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具体路径和内容，能为探索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这一方面的内容在现有研究中仍不充分，有待进一步加强。

注释

[1][18] 高红明：《“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学术界》2018年第9期。

[2][23] 余晓敏，胡翼青：《再度解蔽：为法兰克福学派辩护》，《全球传媒学刊》2017年第1期。

[3][6] 【德】罗尔夫·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上），孟登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32页；第293页。

[4]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7页。

[5] 夏巍：《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概览》，《理论视野》2016年第11期。

[7] 【瑞士】埃米尔·瓦尔特-布什：《法兰克福学派史：批判理论与政治》，郭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8] 【德】弗雷德·拉什编：《批判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9] 【美】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善世联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0] 【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晚期马克思主义》，李永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1] Werner Bonefeld,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On Subversion and Negative Reason*, London: Bloomsbury, 2014.

[12] 【德】汉斯-格奥尔格·巴克豪斯：《新马克思阅读的开端》，《哲学基础理论研究》2016年第2期。

[13] Ingo Elbe, *Marxim Westen: die neue Marx—Lektüre in der Bundesrepublik seit 1965*,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08, S. 29, 401ff, 546ff.

[14] 【意】R.贝洛菲尔，T.R.瑞瓦：《新马克思阅读》，《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6期。

[15] 柴方国：《波洛克与法兰克福学派》，《哲学研究》1995年第1期。

[16] 张亮：《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与政治经济学》，《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17] 单传友：《政治优先性：波洛克论国家资本主义》，《哲学研究》2013年第9期。

[19] 张亮：《霍克海默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创新之路》，《学术月刊》2016年第3期。

[20] 李乾坤：《理性自我否定的现实根源》，《求是学刊》2016年第3期。

[21] 李乾坤：《“新马克思阅读”运动：当代德国马克思研究的一种新纲领的探索》，《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

[22] 张义修：《当代德国马克思研究的总体格局与四种模式》，《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

（作者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胡振良